

中國歷代書院學記



王涵 ◎ 主編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历代书院学记

王涵 主编
张雪微 副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代书院学记 / 王涵主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656-0188-0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书院—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 G649.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5631 号

尊师园书坊 17

中国历代书院学记

王涵 主编

书系策划 侯亮 沐莘

责任编辑 侯亮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05 号 (100048)

电话 总编室: 010-68418523

市场营销: 010-58802818

新华书店: 010-68418521

网址 www.cnupn.com.cn

邮箱 zunshiyuan@hotmail.com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20

字数 182 千字

定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序

朱永新

[01]

书院一词产生于唐代,最初是指官方收藏和校勘书籍的场所,或者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和制度,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书院是在官学衰落、私学不兴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古代教育改革的产物。

书院自宋以后历经盛衰,伴随着近代学堂的兴起而废。但作为古代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教育机构,它不仅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贤人志士,也形成了一整套教学与管理的优良传统。宋以后的大教育家,从范仲淹、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到王夫之、戴震、康有为等,无一不与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史家张正藩教授在评论书院时指出:书院“对于我国教育、社会、政治及学术思想等方面,均有极大之影响。仅就教育而言,如院址之优美,讲学之自由,教训之合一,以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注重自动自发之研究精神等等,若与现代之大学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02]毛泽东早年曾在长沙创办过培养干部的湖南自修大学,也主张吸收古代书院的办学经验,“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03]。可见,书院教育已成为中国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书院教育所积累的经验也已成为中华教育思想宝库的珍贵财富。

书院的学记、学规是研究书院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涵兄经过多年的努力,选择了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二十家著名书院,对这些书院的历史沿革、代表人物、办学特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同时选择了一些经典的学记、学规加以介绍和今译,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在我们的教育到处东张西望、言

[01] 朱永新,著名教育家,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02] 张正藩著:《中国书院制度考略》,江苏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03]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新教育》第5卷1期,1922年8月。

必称西方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整理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教育传统,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与王涵兄认识,是源于“新教育”实验。第一次去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收藏的大量民国时期的著作,就知道他是一位书卷气很浓的校长,一个很有涵养的学者。他在主持学校工作期间,积极推进学校的“新教育”实验工作,2006年全国“新教育”实验第六次大会,我们新教育人称为“进京赶考”,在他的积极支持和大力配合下取得了圆满成功。王涵兄还努力推动“新教育”实验的国际交流,如果不是后来他身体的原因,也许“新教育”的国际交流中心,就会建在他原来所在的学校了。

有的时候,生病也是一种福气。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思考问题,有时间读书研究问题。我想,这本书大概也是王涵兄在养病期间的副产品吧。

最后,在祝贺王涵兄新作出版的同时,还要祝愿他早日康复,回到他钟爱的教育岗位上,把书院的精神气质带到新的学校中去,把书院的开门办学、注重养成、提倡自学、自由争鸣等教育传统融入到新的学校中去。

我期待着。是以为序。

2009年9月1日于北京滴石斋

濂洛关闽此集成 千载陶铸一教魂

【引言】

——古代书院与中国传统教育价值取向

王 涵

大约两年前，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曾与一位美籍华人学者谈及中美文化比较问题。那位学者说：“美国社会之所以在二百多年间稳定繁荣，除了举世公认的法制健全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宗教。宗教和法制是美国社会的两大基石。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无神论国家，难以形成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观，形同散沙，因而长期处于混乱纷扰的状态中。”

对于他的高论，我既不敢苟同，又感到有些诧异和遗憾。中国历史上固然没有出现过大一统的宗教^[01]，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缺乏宗教的力量、缺乏“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观”，相反，正是因为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力量，才使得中国这一古老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生生不息、稳定繁盛。

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传统儒学思想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也是受到历史上中国人普遍认同的、维系社会进步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此，近代学兼中西的大学者辜鸿铭曾剖析说——

“事实上，中国人没有宗教需要感的原因是他们在儒教中有一个可以替代宗教的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综合的哲学与道德体系。虽然儒教这个词在一般的欧洲意义上不是一种信仰，也不是一种宗教，但我要说儒教的伟大之处即在于它不是宗教，虽然它不是宗教，但却有着宗教般的力量而能够使人不需要宗教，这正是儒教的伟大之处。”^[02]

与西方传统教育不同，中国古代学校不仅承担着传授知识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还承担着某些与西方教会相类似的使命和责任，那就是像灯塔一样从思想和精神上引领人们超越现实的人生，向人们传播朴素而深刻的人生哲理，帮助人们形成更具道德责任感的文化价值观。如辜鸿铭所说，古代中国的学校追求的是一种关注社会人生的做人教育，其宗旨是教导学生“做个好人”，而不是像近代西方学校那样只是“教人谋生”（The aim and object of the school in China is not, as in modern Europe and America today, to teach men how to earn a living, how to make money, but, like the aim and object of the Church religion, to teach men to be Good），这就是数千年来中国教育代代承继的真正传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魂所在。

最近一百年当中，根深叶茂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被人为地割裂、抛弃、摧残，以至于根脉断绝、花果飘零，这使得越来越

多的国人已经遗忘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就连一些原本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的论调也越来越接近几个世纪前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陈词滥调^[03]。并且,由于这种传统精神价值的丢失,国人在动荡变迁的历史格局里,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下,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日益茫然不知所措,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文化古国莫大的悲哀。

当西学大举闯入中国之际,梁启超先生曾言:“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他还说:“(国人)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04]这真是一句鞭辟入里的警句,然而“本国学术思想之发明”,非一代人可以成就,须“由其民族自身传递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05],既然如此,则浩叹之余,莫如多做一些整理和介绍的基础性工作,扶根固本,养精蓄锐,以待未来重光。

古代做人教育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史传说中的“上古三代”时期。

中国最早的教育组织至迟萌芽于距今四千年以前,即历来受到学者推崇、甚至将其赋予了浓厚理想色彩的“上古三代”时期^[06]。古史传说中称,尧帝和舜帝都曾经委任过一位名叫“契”的人掌管教育,他的职责是向人民传布“五教”。“五教”的具体内容,后经孟子明确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概述夏、商、周三代之教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以明人伦也。”可见“上古三代”推行“五教”的目的全是为了“明人伦”,也就是将教育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学会做人作为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标。孟子还说,不知“五教”,则人近于禽兽,不成其为人。“五教”明确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五种构成社会的主要人伦关系,如果我们对其内容稍加分析,就会觉察到古人的高明之处:首先,这五种主要的人伦关系是构成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并且不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它固有的价值和意义;其次,这些关系的确定是基于人的良善本性,因而易于被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其三,通过学校教育,将其上升为一种群体的自觉认识,成为一种受世人普遍认同的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体系,从而实现个人、家庭、国家乃至天下太平的治世目标。是以“五教”的提出,不惟体现了中国古代人对于社会人生的深澈了解、研究和探索,并且这智慧的结晶,也必将对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和谐世界的建设产生深远有益的影响。

尽管有人怀疑古史传说的真实性,认为这些不过是出于汉代儒士的杜撰^[07],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人所追寻的教育理想。后世的人们之所以愿意

相信“上古三代”时真的出现过那样一种理想化的太平盛世，也愿意相信通过教育就可以实现人的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是因为他们确信教育是培养人的教育，是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基础，因此，在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中，教育不仅是一种普通的工作、一个职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是承载着社会使命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业。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崇高的教育理想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孔子在“礼坏乐崩”的动荡年代里提出要效仿“尧舜之道”，通过“克己复礼”来实现“天下归仁”的社会愿景。尽管孔子在当时没有机会实践他的教育理想，但其思想学说却在他身后的两千多年当中不断发扬光大，人们越来越相信，孔子及其弟子为世人留下的那部一万一千七百字的《论语》，的确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学的核心是“仁”。对于“仁”，历来诸家的解释概括起来大致有三方面：其一，“仁”就是做人。具体来说，人不能等同于禽兽，人应该是社会人、文明人，是有道德感和自制力的人；其二，“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伦。这种人伦关系是维系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三，“仁”就是爱，是一种超越了人的普通情感而上升为道德层面的大仁大爱，这种仁爱的精神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境界。

与同时代涌现出来的灿若星辰的众多思想家相比，孔子更是一位有着非凡成就的教育家，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子，这从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孔子缔造的儒学是一种基于普遍人性的人生哲学，因而更易于为世人所接受。如前所述，孔子的儒学思想确乎不是一种宗教，但它却有着宗教的精神和宗教的力量，孔子之超卓伟大处即在于——他本人从未企图人们将其神圣化，而只是启示人们像他一样终身不倦地探求社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历史上儒学的第一次复兴是在汉代。此前，秦统一中国后主要是以法家治国，并且还留下了“焚书坑儒”的恶名^[08]。秦始皇对中国文化的戕害，主要在于先秦的思想学说被他的一把火焚毁得干干净净，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这样一来，到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对于先秦儒学的知识是何等的苍白，于是，汉儒竞相以注经为业，很多人穷其一生沉湎于古代典籍之中，以“皓首穷经”为职志，但由于过分注重古书章句上的修修补补、注音正字，反而对儒学思想大义了解甚少，这种学风差不多影响了中国一千年，直至唐代，佛、道二教乘势兴起，儒学更趋末流，尽管当时个别有识之士已意识到，儒学的式微必然招致社会祸乱^[09]，也仍然无力扭转这种局面。

汉唐诸儒在学术文化史上的贡献是在秦火余烬的基础上艰难传承和整理了儒家文献，但因陷于支离破碎的考据之中，反从另一个角度削弱了儒学的影响，使

儒学这种关注社会人生的学问日渐空疏不切实际，不能服务于人生实践。因此，自汉至唐一千年间，尽管历代统治者均提倡尊崇儒术，在儒学自身却反而是以辞害义，未能学以致用。

其间，隋唐两代虽取缔门阀、开科取士，却藐视文教、学校不兴，士子尚慕辞章，悦于不学，偶有究心学术者，又苦于无处求学，只得借住寺院读书自修。科举考试的内容虽然标榜以儒学经典“十三经”为主，但实际录取标准却只认辞章，与儒学思想了无关涉，加之三教并峙，人心不古，此段历史倒真可以称作是“缺乏稳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大唐盛世泰极否来，卒致唐末藩镇、五代动乱局面，原因固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讲，正是长期思想颓废混乱、教育不振的必然恶果，研究历代政治得失者，于此不可不深致意焉。汉唐儒学积弊日久，直接促成了儒学的第二次复兴，即宋学的兴起。

二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宋代政体之完备、文化之繁盛、科技之发达、教育之普及，远超今人想象。究其根源，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曾经给出过一个令人匪夷所思、但或许也是最贴近历史真实的答案——他说这一切都源于宋代开国皇帝内心的“惧”。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被拥戴为皇帝，无论文治还是武功，俱不足与历代开国君主相提并论，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位“民选”的皇帝，并且，是在一片混乱之中被众人推举出来的。这种特殊的际遇使得他不但如历代君主一样敬畏天地鬼神，也畏惧天下百姓和身边勋绩卓著的文臣武将，于是“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由这种惧怕心理转而约束自己、发自内心地诚敬待人，体现在对待文臣的态度上，他在即位之初就勒石警戒子孙不得加害文臣士大夫，“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10]这就使得宋代的文官集团——“士大夫”这一阶层有了远胜前代的最为优越的“话语权”，促成了“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11]。

宋代空前发达的文教事业正是在这样一种宽松的政治氛围中日益滋养并且繁盛起来，历史上所谓的“宋学”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种切近社会人生的哲学，无疑是与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关的。

一般认为，宋学——或称“宋代理学”，是以濂、洛、关、闽等理学宗师所开创的学派为代表。濂，指原居濂溪的宋初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洛，指定居洛阳的北宋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二兄弟；关，指定居陕西关中、与“二程”同时期的理学大

师张载；闽，则指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南宋理学大师朱熹^[12]。

事实上，周敦颐的学说在宋初并无多少影响，且其中夹杂有很多道家思想成分，与宋代理学的真正开创者——北宋“二程”的思想没有传承关系。“二程”虽在幼年时短暂地拜周敦颐为师，接受的也只是早期启蒙教育，对周敦颐的学说并无了解。

“二程”和张载同是宋代理学的真正创立者，如果一定要为他们安排一位思想导师，则可以追溯到宋初名相范仲淹。范仲淹对“二程”和张载均有提携之功，历史上颇为著名的一个事例是，张载青年时期一度打算投笔从戎，他写信给正在镇守边关的范仲淹表达自己的心愿，得到的答复却是：“儒生报国并不一定要战死沙场，重要的是用自己的思想和学识启迪和教育世人。”^[13]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忠告，回乡潜心学术教育，终于成为宋代理学重要支派——陕西关学的创始人。

范仲淹是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正统儒学思想传人，《宋史》记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他一生虽屡遭贬谪，仍“以天下为己任”，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的君国大事。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和经世报国的治学主张以及他本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极富感染力的理想人格，对于宋代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理学的建立、发展与传播，主要是通过书院这一教育组织完成的。宋代著名的书院，都是理学大师传道授业的大本营，历史上著名的“四大书院”^[14]中，应天书院是范仲淹的讲学之所，嵩阳书院是程颢、程颐二兄弟的播道之地，白鹿洞书院由朱熹整顿兴复，岳麓书院经张栻董理其事，皆盛极一时，声名遐迩。宋室南渡后，理学家讲学之风日炽，书院教育踵事增华，除上述著名书院外，吕祖谦创办的丽泽书院、陆九渊创办的象山书院，也都成为理学家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阵地，在教育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据统计，南北宋共建书院三百余家，以地域论，江西为最多，达一百一十二所；以时代论，理宗朝为最多，新设书院四十六所^[15]；以个人成就之功论，殆非朱熹莫属，他不仅先后兴复了白鹿洞、岳麓、湘西精舍等著名书院，还亲自创办了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等书院，其先后讲学和有学术往来的书院更多达六十七所^[16]。

“书院”之称，目前较为公认的一种说法是始于唐代开元年间出现的“丽正书院”^[17]，其职能是皇家藏书之所。唐末至五代时开始出现私家讲学的书院，但这类书院早期的名称却是“精舍”^[18]。现据群书所记推测，到宋代发展成熟的以教育为主要职能的书院，源流大致有二：其一即如“丽正书院”这样的藏书机构。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书籍的流传与庋藏日益普及，“书院”这种原来只有皇家才能拥有的藏书机构，逐渐扩展到州县地方政府，甚而扩展到民间。这种逐

渐涌现出来的各级各类书院,不仅收藏图书,且逐渐成为所在地区的知识中心、文化中心,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传播文化的责任。这就好像现代的图书馆,除收藏、借阅图书以外,还利用自身便利条件,组织起一些文化沙龙、专题讲座,或学术联谊活动,这就使书院逐步具有了教育的职能^[19],起到了引领当地学术和教育发展的作用。其二就是私家讲学的“精舍”。“精舍”始自汉代,其名称本为佛教语,原指方外弟子在风景秀丽之地建起的潜修之所,这些场所除供个人修行外,有时还有弟子追随,于是“精舍”就渐渐成为一种具有教育职能的场所。一般说来,“精舍”大都订有比较严格的规章制度、有系统的修行功课,师徒间以朋友相处,一同起居修行,相与切磋问学,相互关系亲密随意。

宋代书院秉承了上述两种教育组织的传统优势,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较为规范、成规模、成体系的教育组织。书院与政府举办的官学相互补充、互为表里,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共同维系和促进着教育的发展。

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区别,曾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讨论。笔者认为,其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 古代学校一般都指官学,即由政府举办的公立教育,书院则以私人或社会团体举办为主;

* 学校教育内容由政府规定,书院则因以私家讲学为主,教育内容、教学方法都非常灵活自由;

* 自有科举考试以来,学校主要推行应试教育,书院则追求做人教育理想和学术自由,更注意遵循教育规律;

* 学校规模较大,按规定承担着教育普及和人才选拔的双重任务,书院,尤其是私人举办的书院,一般规模较小,追求高等学问;

* 学校以制度为中心,书院以人物为中心;

* 学校一般都设在交通发达的城市中心,书院则大多选择地处偏僻但风景优美的自然环境办学。

由上述几点可以看出,古代书院是真正能够代表学术真精神、教育真精神的育人场所,因而也是中国教育传统中最可宝贵、最值得研究和总结的部分。

三

古代书院追求的是做人教育的理想,承传的是做人教育的传统。

书院教育,尤其是宋以后私家讲学的古代书院,主旨在于承传先秦正统儒家思想。前文谈到,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一种以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为基础

的人生哲学,其所强调的是立人达人的做人教育。宋初教育家曾巩在总结先秦时期的教育时说:“古者乡党学校少长为序,以州处,其有司所施用十有二教,举用六德六行六艺,节用五礼六乐,纠用八刑,论用其乡之老,其体惟以化民成俗为教之意。故其士之入朝、在乡、居家皆有法度而不为非,所以励世而育才也。周之所以垂七八百年而治为称首者用此。”^[20]极力推崇这种“化民成俗”的做人教育为天下治平之本。朱熹在为白鹿洞书院拟订的“学规”中称:“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求取人生大义,而后身体力行、推己及人,进而服务社会。

古人以“明伦”指称做人教育,宋以后的学校、书院,讲堂多以“明伦”命名,就是为了向世人昭示做人教育既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又是教育的核心内涵,舍此之外别无其他任何教育。明代大教育家王阳明在谈到兴办书院的目的时指出:“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明伦’之外无学矣”。他说:“做人教育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教育,偏离了做人教育的教育,可以称之为旁门左道;抨击做人教育的论调,可以称之为邪恶之说;奉行这种邪说的教育,可以称之为功利主义教育;为这种功利主义教育所做的宣传,可以说是骗人的谎言;与做人教育背道而驰的人和行为,可以称之为名利小人和祸国殃民之举”,他强调,“即便是科举考试,也应按照做人教育的要求进行改革,才不愧是选拔真才实学的国家考试;即便是国家对官员的选拔,也应按照做人教育的要求来贯彻落实,这样才称得上是推行道义”^[21]。

这里先要澄清两个概念,即古人常说的“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君子”、“小人”在先秦典籍中常常相对地提出,但在当时却并不像现在一样意味着一种道德高下的评判。其所谓“君子”,“君者,群也”,“子”者,先生之谓。所以“君子”的本意是指能够从思想和行动上引领一群人的导师,或者说是群众领袖;其所谓“小人”,本意并没有包含道德谴责的意味,而只是指居于下位的平民百姓。换言之,“小人”是需要“君子”教育、领导和管理的人,“君子”与“小人”是教育和受教育、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他们作为自然人的基本关系上则是一视同仁的,并不存在着厚此薄彼的意味。

《论语》中记颜渊、仲弓、公孙牛三人向孔子问“仁”,孔子视各人程度不同给出三种截然不同的答案^[22],按照孔子的观点,颜渊、仲弓可谓“君子”,对于他们来说,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仁”;公孙牛则属“小人”之列,只需懂得一点基本的修身道理,能够约束管理好自身的言行就可以了。可见,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对学生并不强求一律,要求所有人都去做尧舜那样的圣人。

所以说，君子有“君子之学”，小人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要在反躬自省，能够安身立命，不给别人带来麻烦、不危害社会就好，如晚明陕西教育家冯从吾所言，“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穷则独善其身”；“君子之学”，又称“大人之学”，其要在个人修身的基础上，尚能推己及人，由一家推至一乡，一乡推至一郡，及至服务社会，造福国家天下，就像康有为所说的那样——“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姻于族者，仁之充也；任恤于乡者，仁之广也；若能流惠于邑，则仁大矣；能推恩于国，则仁益远矣；能锡类于天下，仁已至矣”，这就是古人常说的“达则兼济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人之学”或可称作“为己之学”，“君子之学”则可说是“利他之学”，人之天赋秉性不同，各人人生选择不同，“君子”、“小人”各安所命，只是要做“君子”，就要树立服务他人和社会的远大理想，努力学习“君子之学”，否则，以“小人之学”而履“君子之任”，只会落得个损人害己的下场，古今中外概莫如是，识者宜自警之！

古代推行教育，对于“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是有着严格区分的。一般而言，古者所谓“乡党学校”——即由政府举办的各级各类乡村教育，推行的是“小人之学”，实行的是全民普及的义务教育，教育内容主要是做人修身的基本道理，有时还包括一些职业技能培训；而以“明经取士，为国选才”为宗旨的州郡府学以至中央政府举办的国子监太学，教育对象都是经过选秀（秀才）而被推举出来的人才（举人），准备正式进入“士”这个阶层（进士）的社会精英^[23]，这些经过层层严格选拔的精英人才将“为天下国家之用”，所以必须接受“君子之学”这样的“高等学问”，目的是培养他们能够克制一己私欲，忘记个人荣辱，心系天下社稷百姓，日后成为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领导力量。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古代书院既然以传播“高等学问”为己任，目的是培养堪当社会重任的栋梁之材，故格外重视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道德操守教育及历代政治得失等人文素养的培养。

四

追求做人教育理想的古代书院，具有鲜明的反功利主义倾向。

今人常将私家讲学为主的古代书院与政府举办的官学混为一谈，认为和官学一样，古代书院也是科举应试教育的附庸，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朱熹在谈到举办书院的目的时指出：“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24]，这样才有了兴办书院之举。

所以历史上蔚然兴起的书院教育,乃是仁人志士出于对官学科举应试教育不满,抱着“欲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25]的教育理想而进行的教育实践,其办学宗旨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故而在教育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公元一一八一年初春,应朱熹邀请,南宋理学家陆九渊来到修葺一新的白鹿洞书院讲学。他在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学者之志”——也即读书人做人和求学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的问题。他说:“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这就是学术思想史上著名的“义利之辨”。陆九渊认为:“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历史由来已久,历代名臣大儒也大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现在的读书人当然也不能不参加科举考试。但科举考试的成与败,只与考生的应试能力和主考官的个人喜好有关,并不能分辨出参加考试的人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人。现在社会上将科举考试成绩看成是衡量人才的最高标准,假使考生沉陷其中无法自拔,那么一天到晚所学的,虽说都是古代圣贤的经典,但他的志向,却有可能与古代圣贤的思想背道而驰。将这样的人选拔出来加以任用,他就只会思虑自己职级的高低、薪俸的多少,怎么能够为国家大事和百姓忧患尽心尽力,从而不辜负自己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呢?”

陆九渊的演讲,引起当时在场听众的强烈共鸣,以至不少人纷纷泫然泪下,就连一同听讲的朱熹也认为他的演讲“切中学者痼疾”,当即表示,“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前引陆九渊的这段话,是他事后应朱熹之请所作的追记,想来一定不如当时的演讲那样触动人心,但在今天看来,这些话也还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从本质上讲,古代官学与书院一样,原本都是将做人教育作为办学宗旨的。明季著名宰相叶向高在《首善书院记》中指出:“明兴设科罗才,虽取词章,而学宫功令载在卧碑者,一本于德行,至以‘明伦’额其堂,其大指与三代同。而未流之弊,逐功利而迷本真,乃反甚于汉唐。贤士大夫欲起而维之,不得不复修濂洛关闽之余业,使人知所向往。”

所以官学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已经是严重违背了国家制订的教育方针,是学风腐败的“末流之弊”,这种“逐功利而迷本真”的应试教育,历来被有识之士讥为“俗学”而耻于谈论,明代著名文学家归有光就说过——

“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浅中之徒,转相仿效,更以通经学古为拙,……惟此学流传,败坏人材,其于世道,为害不浅。夫终日呻吟,不知圣

人之书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其得之者，亦不过酣蓐富贵，荡无廉耻之限，虽极显荣，只为父母乡里之羞。愿与诸君深戒之也！”^[26]

读书受教育，“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是个人功利私心的体现。如果肩负着“为国育才”重任的学校不能帮助学生摒弃这种思慕个人荣利之心，切实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切实树立起为国为民、造福社会的远大理想，就不能说是尽到了教育责任；更其甚者，倘若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一味投合学生的功利私心，或者干脆为了学校自身的利益放弃教育责任，彻底沦为科举应试的附庸，从眼前讲，是违背了教育者的良知，直接催生腐败的学风，从长远看，则是贻害社会、祸乱子孙后世之举，能不令人痛心？！

梁启超在谈到他的老师、清末万木草堂的创办者康有为时说：“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备教育家之资格。”其所谓“教育家之资格”，特举一例说明：

“先生初接见一学者，必以严重迅厉之语大棒大喝，打破其顽旧卑劣之根性。以故学者或不能受，一见便引退；其能受者，则终身奉之，不变塞焉。先生之多得得力弟子，盖在于是。”^[27]这里所说的学者“顽旧卑劣之根性”，梁启超将它解释为“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即毫无理想信念、毫无求知问学之意，一心只想着通过科举考试换取个人荣华富贵。梁启超认为，对于此种功利私心，教育者倘不能及时予以当头棒喝，亦不得谓之有“教育家之资格”。

古代书院矢志不渝追求做人教育的理想，旗帜鲜明地反对功利主义教育，其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可为今日教育发展之镜鉴。此中大义，如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订立的“学规”中所言——

一、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二、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三、爱家庭、爱师友、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为求学做人之中心基点。对人类文化有了解，对社会事业有贡献，为求学做人之向往目标。

四、祛除小我功利计算，打破专为谋职业、谋资历而进学校之浅薄观念。

五、职业仅为个人，事业则为大众。立志成功事业，不怕没有职业。专心谋求职业，不一定能成事业。

……

古代书院对于今日教育有何借鉴意义，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对待传统教育的态度上，要防止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已经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出现了太多的摇摆和动荡。

胡适以激进地反对传统文化、倡导“新文化”著称，但他在谈到近代以来全面废

除书院时亦深觉可惜，“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28]。

胡适的感慨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清末张之洞等人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这样的主张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可惜时至今日也仍然没有得到国人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相反，如“新文化运动”中那种两军对垒的尖锐对立局面、“文化革命”中那种彻底决绝地割裂抛弃传统文化的简单化思维，在今日教育界、在社会对于教育改革的态度上仍时时有所表现。在教育的发展演进中，继承和创新固然都极为必要，但似乎更应秉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包容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还有，就是耐心与恒心。

具体说到古代书院，在沉寂了一个多世纪以后，随着传统文化、“国学”热的兴起，似乎又成为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一些地方开始重新修复书院，在其中开设“国学”文化讲座，甚至组织起大规模的孔子祭奠礼，一些地方还将“读经”教育纳入了学校课程……这种表面的喧嚣，形式上的简单模仿，一哄而上的热闹场面，恐怕非但不能使人真正领略到传统文化的精粹，无法承继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更难以促进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

古代书院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诸如自主办学、特色教育、名家治校、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等等，所有这些，都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历代书院赓续和发扬了中国教育的真正传统——做人教育的传统，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满怀教育激情，追寻教育理想，探求教育规律，精诚所至，道脉承传，铸就了中国教育的真精神、真风骨、真魂魄。

巍巍中华，菁莪之邦。教魂归来，霁日重光。我们有理由相信，千余年来中国书院陶铸的教育魂魄与文化血脉，不但不会被短暂的风雨消蚀磨灭，且终将在未来的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大放异彩。

2009年7月22日 初稿草于北京日偏食之际

2009年8月8日 第二稿完成于南京议事园

- [01] 唐代虽将道教立为国教，其间佛教亦数度大兴，但主要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非宗教的原因。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此后李唐王朝对佛、道二教时有扬抑，但将儒学作为治国方略的政策始终不变，对此，唐高祖曾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唐太宗亦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 [02]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在这部用英文写作的论著中，辜鸿铭强调：“在中国，代表着国家信仰——儒教的组织就是学校，学校是儒教这一中国国家信仰的教会。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在中文里，宗教的‘教’与教育的‘教’使用的是同一个汉字。”（This organization in the State religion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 is the school. The school is the Church of the State religion of Confucius in China. As you know, the same word "chiao" in Chinese for religion is also the word for education.）
- [03] 早在十六、十七世纪，当欧洲传教士怀着征服和扩张的野心进入中国之初，就开始宣扬这种观点：“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始终未曾忘记自己的意图：要让中国皈依一种真正的宗教，即他所信仰的宗教。这一意图在下面这页文字中可见一斑，他以其敏锐的判断力对中国那奇特的宗教方面的诸说混合现象作了评述：‘目前，最为通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三大教派（儒教、佛教、道教）实乃一体，人们可以同时信奉这三种教派。这一观点为那些自命不凡的大贤大智者所宣扬。就此而言，他们不仅使自己误入歧途，还以奇妙的方式欺骗了他人。他们自以为，在宗教方面，越是宗派纷呈，国家就越能从中受益。但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因为，本来企图信奉所有的教派，可到头来往往不能虔诚地专心于其中任何一派，……因而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陷入无神论而不可自拔。’”（[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L'Europe Chinoise* 17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 [0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 [05]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三版。
- [06] 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是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的，迄今约四千七百年。据《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推算，夏、商、周三朝共历一千二百二十八年，其后至今二千七百七十九年，合计在四千年以上。古史传说中的尧、舜，在夏禹建国以前，其所处年代，史称“唐虞时代”，据此推算，在距今四千一百年左右，即约公元前二千一百年。另据孟子所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是也”，商汤立国在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前此五百年，即公元前二千一百年，正与前说吻合。
- [07] 上古时期的历史，历来多依赖于《尚书·尧典》中的记载。清代学者阎若璩考据认为，东晋梅賾所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出于后世伪作，如此则彼一时期无信史可言。顾